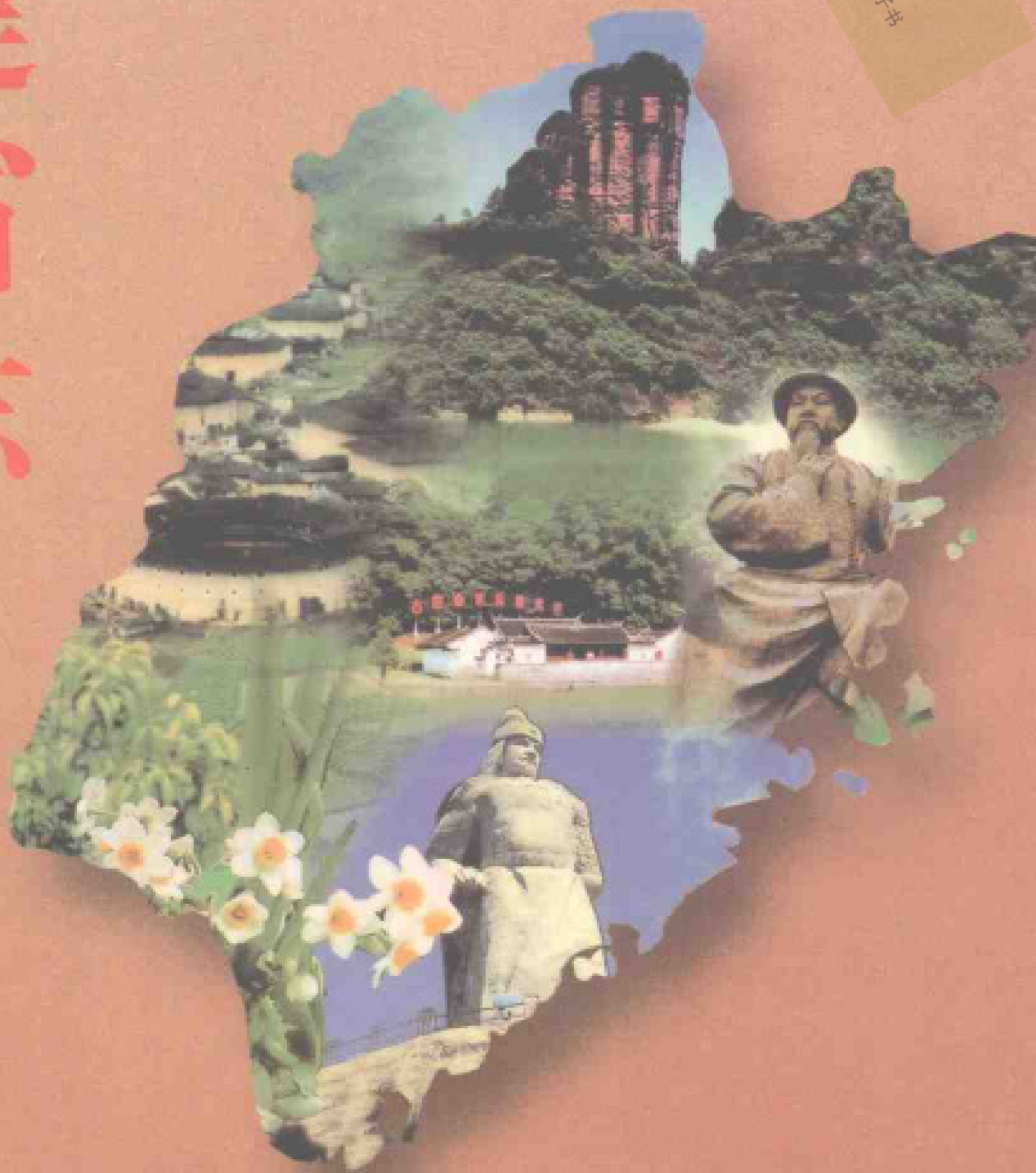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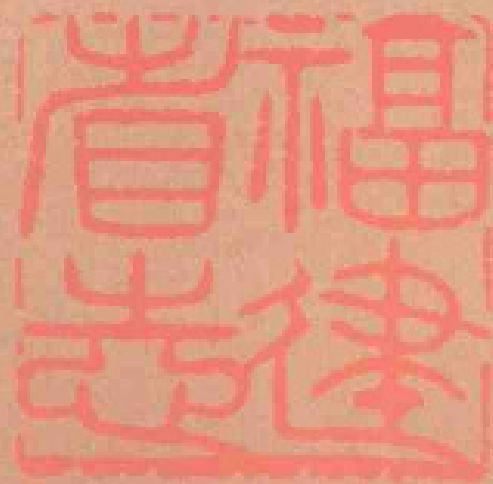
福建省志

出版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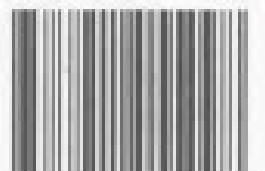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 JIAN SHENG ZHI



ISBN 978-7-211-05509-8



9 787211 055098 >

定价：178.00 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

福建省志

出版志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建省志·出版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7-211-05509-8

I. 福... II. 福... III. ①福建省—地方志②出版工作概况—福建省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969 号

福建省志·出版志

FUJIAN SHENGZHI CHUBANZHI

作 者: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

责任编辑: 史霄鸿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75

插 页: 14

字 数: 829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211-05509-8

定 价: 1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张剑珍（专职）

副主任：阮荣祥 周一风 叶双瑜 吴建春 陈俊杰

委员：林强 刘万勤 陈祖武 封建安 江金和 马长冰
林炳承 张少钦 吴若三 林国清 吴凤章 董启清
杨平 陈小平 郑则梅 杨加清 林寿琦 林育辰
倪健鹤 潘心雄

曾在本编纂委员会任职的人员

主任：陈明义 张立 刘学沛

顾问：张格心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莘 王景阁 计克良 卢美松 艾光 刘玉芳
许怀中 苏炎灶 杨华基 杨建国 陈贤美 陈树田
陈肇胜 顾耐雨 高一哨 唐天尧 程科 舒风
游嘉瑞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宠 王捷 王立勋 王能光 卢增荣 刘立身
刘学沛 庄晏成 任开国 江堤端 李力 李智
李璞 李英标 李宗时 李联明 李德安 张梁
张荣彩 张振郎 张瑞尧 汪子英 沈继武 邵正元
杨思知 杨理正 陈俱 陈一琴 陈世谦 陈明端
陈营官 陈挺成 吴玉辉 林光楚 林志群 林祥瑞
周力文 周其祥 赵文才 赵觉荣 郑心坦 郑学檬
顾铭 凌家榆 曹尔奇 黄杰 黄心炎 黄文麟
黄启权 黄寿祺 傅圭璧 傅家麟 谢水顺 雷恒春
蔡望怀 廖彩玲 薛祖亮 魏忠义

《福建省志·出版志》编委会

顾 问：鲁 岩 林子东
主 任：白 冲
副主任：杨加清 李瑞良
委 员：陈德峰 舒 亭 管 权 邹世超
于乐人 王炳前 赵文淦 吴世灯

《福建省志·出版志》办公室

主 任：杨加清（兼）

《福建省志·出版志》编辑室

主 编：李瑞良
成 员：吴世灯 林定坤 黄学文 林伯苓 余大湖
官大梁 张秋碧 黄文仲 唐文彬

《福建省志·出版志》审稿人员

卢美松 李瑞良 陈建新 赵文淦 胡善美 谢水顺
施宝霖 刘祖陞

《福建省志·出版志》验收小组

刘学沛 卢美松 杨建国 苏炎灶

《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有用的地情资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各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专业分志，专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史直至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并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各分志的上限从实际历史情况出发，尽可能上溯到顶，下限力求写到完稿之年。

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重点，注意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上通用的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规范。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凡加用编者重新调查核实的数据，均有页末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末注。

目 录

概 述	(1)
第一章 出版机构、出版者	(14)
第一节 政府出版机构	(15)
一、古代(1840年以前)官刻机构、官刻主持者	(15)
二、近代前期(1841~1911年)官刻机构	(20)
三、民国时期官办出版机构	(20)
四、闽西苏区出版机构	(22)
五、现代国营出版机构	(22)
第二节 民营出版机构	(28)
一、古代刻书坊肆	(28)
二、近代书坊	(33)
三、近代前期(1841~1911年)民营出版机构	(34)
四、民国时期民营出版机构	(34)
第三节 私家刻书者及社会、团体出版机构	(36)
一、古代私家刻书者	(36)
二、古代宗教刻书单位	(38)
三、近代私家刻书者	(39)
四、近代教会出版机构	(39)
五、民国时期学校出版者	(40)
附一：古代部分官刻名录	(40)
附二：古代部分书坊名录	(41)
附三：古代部分私刻名录	(42)
附四：古代部分刻书书院名录	(43)
附五：古代部分宗教刻书单位名录	(43)
附六：近代前期(1841~1911年)部分出版机构名录	(44)
附七：民国时期(1912~1949年)部分出版机构名录	(45)
第二章 图书编辑	(47)
第一节 编辑方式和出版方针	(48)
一、古代图书编辑方式	(48)
二、近代(1841~1949年)书刊编辑方式	(53)

三、新中国的出版方针·····	(56)
第二节 编辑工序和制度建设·····	(59)
一、古代编辑业务·····	(59)
二、民国时期的编辑环节·····	(65)
三、现代编辑工序·····	(70)
第三节 编辑理论·····	(80)
一、古代编辑理论·····	(80)
二、现代编辑理论·····	(82)
第三章 图 书·····	(83)
第一节 图书分类·····	(83)
一、古代图书门类·····	(83)
二、近代图书类型·····	(89)
三、现代闽版图书类型·····	(90)
第二节 图书内容·····	(96)
一、古代图书内容·····	(96)
二、近代图书内容·····	(107)
三、现代闽版图书内容·····	(113)
附一：古代部分闽刻书目·····	(159)
一、经部·····	(159)
二、史部·····	(164)
三、子部·····	(174)
四、集部·····	(183)
五、丛书·····	(190)
附二：近代（1841~1949年）部分闽刻书目·····	(191)
一、经部·····	(191)
二、史部·····	(191)
三、子部·····	(192)
四、集部·····	(193)
附三：近代（1841~1949年）部分闽版（石印和铅印）书目·····	(193)
一、哲学、社会学、政法·····	(193)
二、经济·····	(194)
三、文化教育·····	(195)
四、文学艺术·····	(196)
五、历史地理·····	(197)
六、科学技术·····	(199)
七、其他·····	(199)
附四：1951~1992年部分闽版书目·····	(199)
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9)

二、哲学	(200)
三、社会科学总论	(201)
四、政治、法律	(202)
五、经济	(203)
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206)
七、语言、文字	(208)
八、文学	(210)
九、艺术	(218)
十、历史、地理	(220)
十一、自然科学总论	(225)
十二、数理科学和化学	(226)
十三、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	(227)
十四、医药卫生	(228)
十五、农业	(230)
十六、工业技术	(232)
第四章 期 刊	(234)
第一节 近代 (1841~1949 年) 期刊	(235)
一、萌芽阶段的期刊	(235)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 (1919~1927 年) 的期刊	(236)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1937 年) 的期刊	(238)
四、抗战爆发后 (1937~1948 年) 的期刊	(241)
第二节 现代 (1949 年 10 月~1992 年) 期刊	(246)
一、50 年代前期的期刊	(246)
二、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的期刊	(247)
三、“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期刊	(249)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期刊	(249)
第三节 新时期的代表性期刊	(252)
第五章 书刊印刷	(288)
第一节 书刊印刷机构	(288)
一、近代书刊印刷业	(289)
二、现代书刊印刷机构	(293)
第二节 印刷物资来源	(295)
一、古代印刷物资来源	(295)
二、近代印刷物资来源	(296)
三、现代印刷物资供应	(297)
第三节 印刷工艺和技术	(299)
一、古代印刷工艺技术	(299)
二、古代雕印文献	(301)

三、近代印刷工艺和装订形式·····	(303)
四、现代印刷工艺和装订技术·····	(305)
第四节 印刷生产能力·····	(308)
一、古代印刷规模·····	(308)
二、近代印刷设备和生产能力·····	(311)
三、现代印刷设备和生产能力·····	(312)
四、现代印刷质量管理·····	(313)
第六章 图书发行 ·····	(349)
第一节 概述·····	(349)
一、古代图书发行·····	(349)
二、民国时期图书发行·····	(351)
三、现代图书发行机构和网点·····	(356)
第二节 图书购销和储运·····	(360)
一、图书购销·····	(360)
二、图书储运·····	(365)
附一：清代四堡外出行销书籍商人名表·····	(367)
附二：晚清、民国时期福建各类书店一览表·····	(390)
附三：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各地、市、县新华书店一览表·····	(412)
附四：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农村集镇新华书店门市部分布情况一览表·····	(416)
附五：1949年9月~1992年福建省新华书店主要经营指标统计表·····	(418)
第七章 出版管理 ·····	(420)
第一节 机构与体制·····	(421)
一、民国时期的出版管理机构·····	(421)
二、现代出版管理体制·····	(423)
第二节 出版管理措施·····	(424)
一、古代出版管理·····	(424)
二、民国时期的出版管理·····	(428)
三、现代书刊出版管理·····	(432)
四、现代书刊印刷管理·····	(440)
五、现代图书发行管理·····	(442)
六、现代版权管理·····	(446)
七、现代出版计划财务管理·····	(450)
附一：清代福建省禁书目录（一）·····	(462)
附二：清代福建省禁书目录（二）·····	(467)
附三：民国时期福建省查禁部分书刊目录·····	(467)
附四：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政府查禁福建部分书刊目录·····	(469)
附五：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永安遭查禁部分书刊目录·····	(470)
第八章 出版群体 ·····	(471)

第一节 出版群体结构·····	(471)
一、古代出版群体·····	(471)
二、民国时期出版群体·····	(480)
三、现代出版群体·····	(485)
第二节 出版群体活动·····	(490)
一、民国时期的书刊印刷工人·····	(490)
二、现代出版团体活动·····	(491)
附一：福建古代部分刻工名录·····	(495)
一、宋元时期·····	(495)
二、明代·····	(498)
三、清代·····	(503)
附二：福建省 1992 年以前出版专业高级职称名录·····	(506)
附三：福建省 1992 年以前出版系列（书刊印刷部分）高级职称人员名录·····	(508)
附四：福建省 1992 年以前书刊印刷系统（包括兼印书报刊印刷厂）省级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录·····	(509)
附五：福建省入选历届全国出版理论研讨会论文一览表·····	(512)
大事年表·····	(516)
编后记·····	(544)

概 述

福建出版业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福建位于祖国东南沿海，境内山峦起伏，河谷穿插其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岸曲折，多岛屿，与台湾隔水相望。在地理上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交通不便，但也常避开北方战乱，社会相对安定。背山面海，既囿于山海之隔，又兼有山海之利。山岚与海风交织，山岳文化的封闭性和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兼备。土著居民古闽越人早就生息其间。在历史上，福建的开发是与中原汉族人民入闽造成民族大融合同步的。第一次大融合是战国秦汉时期，以秦闽中郡的设立和汉闽越国的建立为标志；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孙吴的建安郡和晋代的晋安郡为标志；第三次是五代十国时期，以王氏建立的闽国为标志。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碰撞和融合高潮，福建地方文化蓬勃兴起，不仅与其他地区同步发展，而且拥有自己的自然地理优势和独特的历史积累。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的闽国以地方割据政权形式出现，既远离中原地区的政治动乱，又接受中原文化的大量渗透，使得文化空前勃兴。进入北宋以后，福建经济开发由北而南，由东而西，扩及八闽大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都达到空前规模，有些方面还跃居全国前列。

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文化的繁荣。福建从唐代后期就形成了读书好学的社会风尚，并逐渐成为科学文化的发达地区。《宋史·地理志》说，闽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北宋以后，福建名流显宦屡见，文人学者辈出。仅在王安石变法前后，闽人位居宰臣要职的，就有建安吴育，建阳陈升之，晋江曾公亮、吕惠卿、蔡确，浦城吴充、章惇，同安苏颂等，稍后又有仙游的蔡京、蔡卞、叶颙，邵武的李纲、黄潜善等。宰辅以下的更是多不胜数。宋洪迈《容斋四笔》卷五称：“七闽二浙……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

自然地理因素的独特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为福建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准备了充足条件。

一

福建古代出版业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自宋至明，长时间居全国前列。

根据现有记载，福建出版业肇始于唐宋五代（或说始于中唐，但没有充足证据）。在图书编辑、刻印和售卖诸环节中，最早出现的是图书售卖业。清《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仪礼图序》称：“盖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这是关于唐代福建书肆的唯一记载，虽是后人所述，没有直接的证明，但福建图书编辑和刻印活动到唐末五代已见诸当时的文献。唐末莆田名士黄滔曾编辑《泉山秀句集》30卷，是一部闽人诗歌总集。在这以前，闽人已有著述，但多以单篇流传。把分散流传的闽人诗歌编为一体，这可以说是福建图书编辑工作的开端。与此同时，福建的图书雕印业也见诸记载。与黄滔同时的莆田另一名士徐寅在《自咏十韵》中写

道：“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钓矶集》卷六，又见《全五代诗》卷八十三）此诗写于泉州，徐寅知道自己的诗赋已在福州“镌印卖”，可见当时王审知治下的福州地区已有图书雕印业和售卖业。徐寅的诗赋集是已知福建最早的坊刻本。福建最早有堂号可考的书坊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刻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130卷的建邑王氏世翰堂。北宋时，福州地区又出现了官刻本。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北宋后期（约1086~1125年），福唐郡庠（即福州府学）曾以景祐监本为底本翻刻班固《汉书》100卷。这是已知福建最早的官刻。最早见诸记载的家刻也在北宋出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北宋名臣蔡襄于嘉祐四年（1059年）知泉州时撰《荔枝谱》一卷，“书而刻之”，手写上板，至南宋时书板“犹藏其家”，可见这是家刻。总之，福建最早的刻本，包括官刻、坊刻和家刻，都在五代至北宋期间出现于福州附近的沿海地区。

南宋以后，福建刻书业进入繁盛时期。首先是闽北建阳一带刻书业高度繁荣。这不是偶然的。唐中期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南宋建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闽北位于闽、浙、赣接合部，是沟通福建与中原地区的走廊，建阳则是闽北的交通要冲。随着中原人士的大量南来，闽北成为中原文化的传播基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建阳麻沙位于闽北走廊的中心，虽地处群山之中，但雕版用木和印书用纸可以就地取材，发展刻书业的物质条件十分充足。这些因素促使建阳一带成为全国最早的刻书基地之一。建阳刻书起源早，发展快，书坊之多，规模之大，刻书数量之巨，技术之精和流传之广，都是全国少有的，到南宋时已号称“图书之府”，与蜀刻、浙刻并称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二载：“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

建阳刻书以坊刻为主。据统计，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二镇书坊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0多家。其中不少是刻书世家，这是古代福建刻书业的一个特点。这些书坊能够做到代代相传，经久不衰，主要由于他们讲究经营之道，注意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图书结构和经营机制，力求在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些书坊特别重视图书品种和版本选择，聘用当地文人参加编校，创办雕印作坊，建立销售网络，把编、校、印、售诸环节联为一体，成为工商联营企业，实力雄厚。建阳刻书范围广泛，门类众多，包括经史和诸子书、诗文别集和选本、时文和科举应试用书、字书韵书、启蒙读物、通俗小说，以及农书、医书和日用杂书等等。

宋代福建刻书，除建阳、建瓯（建安府治）外，还有闽北的邵武、延平，沿海的福州、莆田、泉州、南安等地，内地的宁化、汀州、上杭等地，刻书业星罗棋布，遍及八闽。福州是古代大型图书的雕印基地。我国第一部民间摹刻的佛教大藏经《崇宁万寿大藏》，就是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在福州东禅寺开雕，崇宁二年（1103年）竣工的，共雕印大藏经6434卷、580函，规模比开宝年间朝廷派官员到四川雕印的《开宝藏》还要大，世称《崇宁藏》或《东禅藏》。宋徽宗时又先后在福州开元寺雕印佛经《毗卢大藏》（即《开元藏》），在闽县九仙山万寿观雕刻道经《政和万寿道藏》，都是多达五六千卷的大型图书。在数十年间连续进行规模如此巨大的雕版工程，这充分说明宋代福州地区雕印力量之雄厚。

宋代福建出版业的繁荣，还表现在图书流通方面。特别是建阳书坊，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拓展流通范围，把图书销往大江南北，直到朝鲜、日本。南宋时有人说：“文公（指朱熹）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所谓“犹水行地”，就是形容建阳图书流通顺畅，

行销各地。朱熹也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三引）。宋末建阳学者熊禾称“书籍高丽、日本通”，可见建本在宋代就已远销国外。清学者杨守敬说：“建宁书本满人间，世历三朝远百蛮。”既说明其持续之久，又指出其流通之广。

随着刻书业的兴盛，宋代福建开始出现一批出版家和编校人才。建阳余仁仲、蔡梦弼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之后，元代福建出版业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仍然是全国刻书中心之一。首先是因为建阳刻书业继续保持旺盛势头。麻沙、崇化书坊林立，除宋代老牌书坊继续经营外，又出现了一些新书坊，其中不乏规模大、出书品种多的名铺。如叶氏广勤堂，自元至明，世代相传，刻书规模可与余氏相比。其次是在官刻系统中，各地官学刻书异军突起，从学司、府学到县学，都纷纷刻书，蔚为风气。特别是书院刻书，以校刻精细闻名，是刻书业的生力军。此外，私家刻书，也时有佳槧。就刻书系统而言，坊刻仍是主体。就地区而言，沿海地区一度受元初战乱和灾荒影响，但随着生产的恢复，刻书业也得到了发展。特别是福州、泉州等地的儒学、郡庠、书院、儒司等官刻系统，因有学田学粮收入，经济实力雄厚，刻书相当活跃。元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在福州雕印《资治通鉴》294卷，三山郡庠刻郑樵《通志》200卷，福州路儒学先后刻印《礼书》150卷、《乐书》200卷，都是元代著名的大型图书。以坊刻为主体的众多刻书单位，形成了全省性的刻书网络。

元代福建刻书门类也有拓展，书籍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元朝统治者在控制南方以后，逐渐改变民族压迫政策，重视文治，“贵汉人，延儒生”，兴学立教，推崇程朱理学，实行科贡并举，从而使四书五经和科举应试读物成为刻书业的重要项目。其次是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平话小说、元人散曲也成为建阳刻书的新品种，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刻书风格方面，元代建阳率先采用黑口，便于折叠装订。建阳坊刻多用简体字和俗字，特别是小说、类书。其中有些简体字一直沿用至今。在序目之后或卷末刊刻牌记，说明版本和刊印情况，兼做广告宣传，元代也已流行。书籍的装帧形式在唐以前的帛书都采用卷轴装。隋唐以后，雕印纸书逐渐改为旋风装、经折装，唐末出现的蝴蝶装是宋代的主要装订形式。南宋以后出现的包背装到元代已十分流行，直到明代嘉靖以后才被线装所代替。此外，元代建阳刻印的平话小说已大量采用插图，上图下文，结构匀称，刀法圆熟，风格浑厚古朴，被称为建安画派。

元代末年，建阳麻沙遭受兵火之灾。经过短时间消歇，到明代初期，建阳刻书业又迅速发展，特别是麻沙以西不远的崇化书坊非常繁荣，使建阳刻书业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并进入又一个高峰期。明《八闽通志》卷二五称：“建阳麻沙、崇化二坊，旧俱产书，号为图书之府。麻沙书坊元季毁，今书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书坊所刻者也。”到明代中叶，麻沙书坊业也已恢复，与崇化隔山相对，书坊如林，称为“两坊”、“书林”。这是建阳刻书的极盛时期。据统计，明代建安、建阳书坊多达90家左右，其中有堂号姓名可考的就有50家左右。最著名的是余氏、刘氏、熊氏、叶氏等。在这些书坊中，不少是百年以上的老铺。嘉靖《建阳县志》卷三开头有一张书坊图，标明书坊分布情况。据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每月有定期的书市，这在当时是全国仅有的。这种盛况一直保持到清初。康熙《建阳县志》卷一载：“是日里人诸商会聚，各以货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物交易，至晡乃散，俗谓之墟。而惟书坊书籍比屋为之，天下书商皆集。”书坊业的繁荣使建阳成为全国性的书籍商品批发地。

明代福建刻书的地区分布比前代更为普遍。除闽北和东南沿海一带外，闽西沙县、宁化、上杭、长汀等地刻书业也颇为繁盛。除坊刻外，明代福建的官刻和私刻也很发达。

明代福建刻书业的繁荣集中表现在出书的品种数量上。据载明代建阳出现了一卷《建宁书坊书目》，虽未流传下来，但嘉靖《建阳县志》也列有书目，到嘉靖二十四年，建阳刻书已达451种。这以后所刻的建本为数更多。据张秀民估计，其数当在千种左右，居当时全国各地书坊出书总数之首。据万历年间周弘祖《古今书刻》所列，福建刻书共470种，居全国第一。其中366种为坊刻，占全国坊刻的14.6%。明胡应麟《经籍会通》说：“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这反映了明代福建作为全国性刻书中心之一的特点。就福建全省而言，明代刻书地区之广，机构之多，数量之大，流传之远，都超过了以往各个时代，达到了极盛时期。

明代福建刻书内容更为广泛，经、史、子、集俱备，刊刻最多的是科举应试读物、启蒙读物、通俗文学作品和医书、民间日用书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业性城镇繁荣，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的读者群，适应这个阶层需求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成为刻书的热门之选。据统计，自明嘉靖至泰昌（1522~1620年）年间，建刻小说、戏曲共有23种，占整个明代通俗小说总量的20%左右，居全国第一位。现存明代《三国演义》的建阳刻本就多达13种。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收录明代建阳书坊刻印的通俗小说有30多种。与此同时，建阳的刻书技术也不断改进，书籍插图水平大为提高，在徽派版画崛起的情况下，仍保持建安画派古朴粗犷的风格。此外，明代福建出现了铜活字印书。嘉靖年间建阳铜活字刻印的《通书类聚克择大全》和《墨子》二书，现藏北京图书馆。在刻书业繁盛的背景下，明代建阳出现了一批文化素养很高的出版家和编校人才，熊大木和余象斗就是这个时期著名的出版家兼通俗小说家。

除出版家外，从南宋到明代，福建的刻书业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刻书工匠，他们在书版、雕字、印刷、装帧设计等方面技术娴熟，工艺精湛，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达到了当时全国先进水平，甚至影响到海外。特别是元末明初，福建刻工应来华的日本僧侣之聘，东渡扶桑，传播刻书工艺。其中知名的工匠有福州的陈孟才、陈伯寿和莆田的俞良甫。他们赴日之后，寓居京都附近的嵯峨，从事汉籍的刻印工作。俞良甫所刻印的书籍被日本人视为精品，称为“俞良甫版”。这些赴日的中国刻工把雕版技艺传授给日本人，使雕版印刷术在日本广泛传播。当时正是日本“五山文化”兴起之时，五山版书籍大多出于赴日的中国刻工之手。他们直接促进了日本“五山文化”的发展，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明代福建刻书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不少书坊刻书粗制滥造，编校不精，质量低劣。这种情况在当时已为人们所诟病。

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古代刻书业，到了明代末期，渐趋衰落。明末清初，从清兵南下到三藩之乱，福建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变，尤其闽北是南北交通孔道，难免兵燹之灾。清初康、雍期间，建阳刻书有所恢复，著名文人朱彝尊和查慎行结伴游闽时还有诗吟咏麻沙书坊。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已经失去了明代全盛时的光芒。清代福建的刻书业，应首推福州。

福州本是福建刻书业的源头，宋明时期福州刻书业的繁荣仅次于建阳。到清代，承担大型图书刻印任务的仍然是省城福州。康熙年间刊印的《正谊堂全书》和乾隆年间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书》都显示了福州地区的刻印力量。当时福州的官刻和坊刻都很活跃，官方刻印大型图书时往往借助坊刻的技术力量。同治年间刻印的《重纂福建通志》就是一例。除福州外，沿海的莆田、泉州、漳州和闽西长汀、宁化等地区，也都遍布刻书作坊。泉州涂门街近郊的田庵、后坂等村是刻工聚居之地。长汀四堡刻书业在清中叶曾盛极一时，先后开设大小书坊百十家，“家有藏板，岁一刷印，贩行远近”，刻印业成为全村性的家庭手工业，在外省贩卖书籍的四堡乡民先后多达数百人，足迹远及川、黔、云、贵、两广等地。但四堡书坊规模不大，纯属商业性经营，从当时的市场需要出发，以科举应试和日常生活用书为大宗，文化品位不高，加上刻印技术不精，缺乏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几乎没有刻本流传下来。总的说，在江苏、安徽等江淮地区和北京等地刻书业高度繁荣的情况下，以往建本的销售市场已被苏皖等地的刻本所占领，清代福建刻书业已经衰落，失去了全国性刻书中心的地位。

二

鸦片战争以后，福建出版业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文化随着西方侵略势力的渗透而大量输入，传统文化面临严重挑战。福建出版业在各种文化潮流的激荡和冲突中改变了面貌，传统的书坊书铺迅速衰落，近代出版业应时而起。

福建近代出版业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到独立的过渡时期。初起时依附于外国资本，后来又依附于洋务机构。外国传教士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在境外出版中译新旧约《圣经》和《华英词典》等中文书籍，千方百计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就是说，最早在福建流通的教会出版物是在境外出版的。福建最早成立的近代出版机构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美国卫理公会在福州创办的罗札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该公司采用铅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第一副中文铅字是向香港英华书院印字局买来的。公司主要出版中文《圣经》、传教读物、课本和方言读物，并出版杂志《中华录和传教士录》、《卫理会月刊》等。公司还为厦门、汕头、台湾、香港以及北京、九江等地卫理公会承担印刷任务。1903~1904年间，上海卫理主教会和南方卫理主教会联合罗札里奥·马卡尔出版公司在上海组建中国卫理公会出版社，福州的公司就成为这个出版社的福州分社，一直办到1915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州红衣主教团在福州创办红衣主教团出版社，属海外传教委员会领导，主要出版传教读物。此外，传教士还在福州创办了一些杂志和报纸。由于新式印刷业务日益扩大，传教士又在福州创办新式印刷所。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英美传教士在福州天安寺设立美华印刷所，从上海购进日本产的对开、四开铅印机及圆盘机和铅字，承印各种书刊。继福州之后，厦门传教士也从事出版活动。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促进了福建近代出版业的产生，开始出版西学著作。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由于教学需要，船政学堂在很短时间内编写出《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同治七年（1868年）在福州一家教会办的印刷厂出版。不久此书由船政局法籍监督日意格改编扩大为一般词典，改名《法汉袖珍词典》，同治十二年（1873年）出版。除工具书外，学堂还编印数学、天文、地

理等教材，这是近代福建最早出版的西学读物。

传教士创办的近代出版业是以采用新式印刷技术为特征的。传教士一面研制中文铅字，一面引进西方石印、铅印技术。这种新式印刷技术突破了雕版印刷和古代活字印刷的种种局限，工艺先进，工序简化，速度快，效果好，很快就显示了它的优势。到光绪年间，先是老式的刻书机构开始采用石印技术，继而又成立了不少采用新技术的新式印刷公司。前者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厦门会文堂石印《增补汇音妙悟》、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宏文阁石印《闽省官话捷中捷》等，后者如光绪末年成立的福州印刷公司铅印《莆阳课士录》等。这意味着福建的雕版印刷随着新式印刷技术的传入而逐渐被淘汰。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福建的出版业进入了以石印、铅印为主体的新阶段。全省各地先后成立了许多新型的印刷所。仅福州一地就有：民国元年（1912年）私立福建政法学堂设立的利福印刷所、民国二年（1913年）苍霞学校设立的普益印刷所、民国二年（1913年）设立的省政府印刷所、民国四年（1915年）设立的新闽印刷所、民国五年（1916年）一些基督教徒集资设立的彬文印刷所、民国七年（1918年）设立的环球印刷所、民国九年（1920年）由法国天主教会设立的公教印刷所、民国十年（1921年）设立的天泰印刷所等等。其中除省政府印刷所外，都是私营企业。除福州外，泉州、云霄、浦城、建瓯、顺昌、南平、将乐、长汀、上杭等地也先后成立石印或铅印的印刷所，规模大小不一，承印各种账簿表册，规模大的可以承印书刊报纸。五四运动以后，全省书刊已普遍使用铅印，新型出版业已具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民国时期福建的出版业可分两个阶段。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12~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25年，福建出版业发展缓慢。出版机构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等沿海地区。出书品种有限，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在这段时间内，值得注意的是闽西苏区在艰难环境下创办的出版事业。民国十八年（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建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成立红色政权。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苏区政府从创办报刊入手，建立出版机构，出版政治、文教读物，宣传革命文化。特别是重视社会教育，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设立夜校，编印各种课本。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底，闽西苏维埃政府创办机关报《红报》。同年夏，中共闽西特委创办机关刊物《闽西红旗》。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共青团闽西特委创办机关刊物《闽西列宁青年》。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成立后，出版了《红旗》、《战线报》等刊物。据统计，当时在闽西根据地内创建的报刊达30多种。与此同时，闽西苏维埃政府创办了闽西列宁书局，出版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识字课本》、《社会主义浅说》、《看图识字课本》、《列宁小学读本》、《革命歌曲选集》等书籍，还出版了《阶级斗争讲义》、《红军军事概要》、《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红军识字课本》等。不久，又在永定设立分支机构。（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苏区政府又在靠近瑞金的占城井头村组建“青年实话印刷所”，印刷书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出版活动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中共地下组织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创办了一些报刊，还出版进步书籍。与此同时，厦门大学和私立协和大学等院校和研究单位也出版了一些书刊，包括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国民党省政府也先后出版一些官办刊物，但影响不大。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福建的出版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福建省政府从福州迁往永安，许多文化机构也纷纷内迁，永安成为战时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进步作家黎烈文来闽，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托，组建改进出版社，深得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起，先后出版《改进》、《现代文艺》等6种期刊，并出版了《改进文库》8套共99种。其中有不少是著名学者和作家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出书规模和质量都达到全国第一流水平，使改进出版社成为战时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对发展进步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民国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当局加紧压制进步出版活动，改进出版社从鼎盛走向下坡。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0月，由谌震等人创办的东南出版社成立，在进步文化人士的支持下，先后出版了30多种进步书籍，包括郭沫若和王亚南的著作。该社门市部还经销许多进步书刊，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永安的出版业再次呈现繁荣景象。据统计，从民国二十七年到民国三十四年的8年内，永安先后有出版社和编译机构59家，书店20家，印刷所19家，先后出版报纸12种，期刊129种，各类图书800多种。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广，在国统区仅次于重庆和桂林。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著名国际时事评论家羊枣在永安被捕，大批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之后随着抗战胜利，许多文化机构迁回福州，永安的出版繁荣景象迅速消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福建政治黑暗，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出版业日趋萧条，濒临绝境。

近代是福建期刊从萌芽到发展的时期。最早的期刊是晚清时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先是供外侨阅读的英文刊物，后来又出现宣传基督教义的中文刊物。最早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刊物是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版的《福报》，由闽清黄乃裳创办，馆址在福州。几年之后，福建第一家白话文刊物《福建白话报》也在福州创刊。辛亥革命前后，福州、厦门两地出现刊物十多种，形成办刊物的热潮。到北伐前夕，办刊物的地区已由福厦两地扩展到沿海和内地各主要城市。刊物的性质和内容也由单一到多样，有综合性刊物，也有专业性刊物。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抗日爱国热潮的兴起，福建各地刊物蓬勃发展。据统计，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二十六年7月，福建各地创办刊物700多种。抗日战争时期，以永安为中心的办刊热潮几起几落，到抗战胜利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舆论的钳制而趋衰落。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出版事业获得了新生。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成立了福建新华书店，开展人民政权下的图书出版发行业务，为建立新型出版机构准备了条件。1951年7月1日，福建人民出版社在福州正式成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出版机构在八闽大地上产生的标志。

从福建人民出版社成立到现在，几十年来，福建出版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跟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同步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概括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51年到1956年是福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初创和发展阶段。

福建人民出版社建社初期，一边保证社会急需的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一边逐步建立新型的出版体制。从1954年起，加强了出版社领导班子的配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何若人兼任社长，林子东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成立了编委会，统一领导编辑出版工作，下设政治理论、文教、文艺等编辑室，机构逐步健全。同时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实行书稿三审制、岗位责任制、年终考核和总结制度。此外，成立了经理部，加强了经营管理。办公楼、宿舍和图书仓库等基础设施也次第建成。随后相继建成了新华书店城乡发行网点。新型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逐步代替了旧体制。作为地方出版社，这个时期的出版工作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出版方针。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任务，出版一些时事政治读物和干部学习材料；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政策法令；配合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的新形势，出版一批农业生产知识读物；配合扫盲运动，出版识字课本、民校教材和通俗文化读物，以及通俗文艺和演唱材料等。1953年开始实行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版工作也努力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1956年合作化高潮和“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中，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现了一个出书热潮，不仅书籍的数量迅速增长，品种和门类不断扩大，而且开始系统出书。年出书从1954年的62种增加到1956年的167种，年总印数从1954年的467万册增加到1956年的1248万册，增长167%。开始注意整理出版具有地方特色的图书，如《中医验方》前后共出7集，行销海内外。又如整理出版闽剧《炼印》、梨园戏《陈三五娘》、高甲戏《桃花搭渡》等，均受群众欢迎。

(二) 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福建出版事业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面对1958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上对各类图书的需求日益广泛，出版工作的任务日益繁重，而原来的出版社、印刷厂和发行单位，各有所属，不相协调。为了加强对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1958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决定以福建人民出版社、省新华书店和省文化局新闻出版科为主体，成立福建省新闻出版局，统一领导图书编辑、印刷、发行工作。不久又复建福建新华印刷厂，归出版局领导，从而形成了编、印、发统一协调的运行机制。1958年12月成立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划归省教育厅领导。

在1958年的“大跃进”热潮的影响下，出版工作也出现过热现象。出书数量激增，由以往平均每年不足100种猛增至466种，内容质量下降，片面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食堂，助长了浮夸风。1959年上半年根据省委宣传部指示，在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下，对出版工作进行整顿，从检查图书质量问题入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总结，强调了普及与提高、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配合中心任务与满足读者多方面需要并重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纠正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配合当前任务、忽视长远需要的倾向。在贯彻调整巩固的方针中，出版社1960年和1961年先后两次进行全面的图书质量检查。通过检查，树立了质量第一的观念，并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各项工作制度。通过整顿，调整了出版任务，出书品种数量逐步下降，而图书质量逐步提高。与此同时，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在这基础上，加强经营管理，搞好成本核算，改善了经营状况。银行贷款由1960年的120万元降到1962年的50万元。出版总成本下降4.9%，年利润率保持在25万元左右。1961年6月省新闻出版局撤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省新华书店归省文化局领导。

1964年8月，福建人民出版社被定为厅局级建制，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广大出版

工作者在工作实践中，吸取了前几年片面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教训，坚持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陆续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好书，如《统计学原理》、《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汇编》、《中医基础学》、《新儿科临床手册》、《福建常用草药》等，并继续整理出版一批地方优秀传统剧目，如莆仙戏《春草闯堂》、《团圆之后》、《嵩口司》和高甲戏《连升三级》等，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建出版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极大破坏。出版工作被全盘否定，出版机构实际上被撤销，90%以上的人员下放农村，另设毛主席著作印制办公室，主要印制毛泽东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印制发行毛泽东著作9200万册（套），全省人均4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的印数也超过全省人口数。1971年初，《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以福建省新华书店名义出版发行，起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面作用。同年10月，省革委会政治部设立出版事业组，下放农村的编辑人员陆续调回，同时恢复福建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毛泽东著作和中央文件、“两报一刊”社论单行本等，并逐步出版少量其他图书。但许多政治书籍往往是一边出版，一边由于形势变化而报废，造成极大浪费。1972年清理仓库，报废图书达5303万册，542万元。

（三）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福建出版事业经过恢复整顿，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1977年中央号召拨乱反正，出版工作开始出现转机。在这以前，1975年10月，省革委会出版组撤销，成立福建省出版事业管理局，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省新华印刷厂和省新华书店也回归出版局领导。

出版机构恢复后，面对着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广大读者迫切需要图书。当时省出版局局长鲁岩和其他领导，决定把解决书荒作为当务之急。从1977年底起，出版社一面把上海科技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租型造货，赶印上市，一面组织作者编写《中学生学习》丛书等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各科基础知识读物，于1978年上半年开始陆续出书。这套丛书正赶上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学教学的迫切需要，一印再印，发行数百万册，受到省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誉。福建的高考录取率也由华东区末位上升到第二位。从此，闽版文教书籍享誉全国，历久不衰。除及时出版文教读物外，政治、经济、文艺和科技读物也陆续出版，初步满足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福建省出版工作进入了新的时期。省出版局党组领导出版工作者，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在实践中大胆摸索，突破“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框框，迈出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步伐。学术著作《〈资本论〉解说》、大学教材《中国古代史》，外语读物以及长篇小说和文艺创作等面向全国的图书陆续出版，出版工作出现勃勃生机。国家出版局于1979年12月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根据出版战线的新形势，明确提出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省出版事业的发展。在立足本省，创造特色的思想指导下，福建加强了体现福建地方特色和闽台关系图书的出版工作。《林则徐书简》、《陈嘉庚传》、《台湾史略》、《高山族简史》、《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修订本）等历史读物，《武夷山水》、《泉州名胜古迹》等旅游读物和《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等书先后问世，获得好评。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促进了出版界的思想解放。

福建出版界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服务大局的意识，及时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作为一项重要任务。1980年9月出版的於梨华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祖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当代文学作品。

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下达《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明确提出出版工作的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出版工作的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和积累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个条例使福建省出版界进一步明确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加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性转移，使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更具活力。同年5月，国务院和中宣部批准国家出版局提出的中外合作出版的方针，福建省出版局根据这一精神，提出“发展对外”的方针，大大促进了福建出版业对外开放的步伐。

1981年6月，大型文学期刊《海峡》创刊。同年9月，《中篇小说选刊》创刊号问世。1985年1月海峡文艺出版社与香港中外文化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中外电视》创刊。这些文艺刊物都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1982年制定的《福建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年）》上报后，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于同年11月通报表扬，要求各省仿效。在这规划下，《八闽文献丛刊》陆续出版。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82年，福建出版工作初步出现了繁荣局面。在1980年到1982年这三年中，全省共出版各类图书（不包括课本和租型书）871种，其中一般图书632种，占72.6%，连环画155种，占17.9%，年画84种，占9.6%。平均每年递增33.9%。每年总印数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1500万册增长到1982年的近5000万册。图书门类不断扩大，品种大量增加，质量显著提高，重印率日益上升。政治经济读物以《〈资本论〉解说》为代表，教育读物以《中学生学习》丛书和中学各科学学习手册为代表，历史读物以《中国古代史》为代表，外语读物以《英语基础语法新编》为代表，文艺读物以《金瓯缺》为代表，科技读物以《养蜂学》和《福建省昆虫名录》为代表，各个门类都有了一些保留书目。与此同时，书刊印刷和图书发行工作也迅速由恢复走向发展。福建新华印刷厂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效率低、质量差的情况下，加紧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在短短几年内，先后购置大量先进设备，开始完成了排字由热排向冷排的过渡，制版由老式照相制版向电子分色的过渡，印刷由铅印向胶印的过渡，彩印由单色向多色的过渡，装订由手工向联动化的过渡。1982年开始，与福建省对外贸易总公司合办的福建彩色印刷厂，全部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1984年投产后，产品质量享誉全国。

在这段时间里，图书发行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重点是调整全省新华书店管理体制，促进基层书店的基本建设和网点建设，保证发行渠道畅通。1978年底经省革委会批准，自1979年1月1日起，全省新华书店的人事、财务收归省新华书店统一管理。到1985年体制再度下放时为止，全省共安排书店基建、土建项目69个，总投资1875万元，总面积11.47万平方米。到1984年已实际投资1386万元，已竣工的有45个项目，在体制下放后继续完成的有24个项目。在调整管理体制，促进网点建设的同时，新华书店对全省中小学课本的供应做到了“课前到书，人手一册”。1983年全省图书发行量比1976年增加2.78倍，农村图书发行量比1978年增长2.4倍。

1983年3月，福建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撤销，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代行其领导和管理职能，人员编制由273人增加到482人。6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把出版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指出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阵地，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

成部分，要求出版部门贯彻改革精神，打破不适应新形势的老框框，创立新章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生产力，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开拓新领域。同时指出，注意防止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单纯追求利润，忽视社会效益的倾向。1984年6月，国家出版局在哈尔滨召开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使出版社由单纯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在出版单位内实行岗位责任制。为了响应这一出版改革的重大举措，福建人民出版社积极酝酿以有关编辑室为基础，成立专业出版社。1984年8月成立了以福建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为基础的海峡文艺出版社和以少儿读物编辑室为基础的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2月又分别成立了福建美术出版社和鹭江出版社。福建出版部门逐步进行体制改革后，加快了发展步伐，1985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改为福建省出版总社。1988年6月成立福建省新闻出版局，与福建省出版总社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1979年挂牌成立的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也开始独立经营。1988年5月成立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另外，1980年11月成立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属省测绘局领导。1979年复办的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80年12月改名为福建教育出版社，由省教委主管。接着，厦门大学出版社和海风出版社也相继成立。至此，全省共有11家出版社，其中属于省新闻出版局系统的有7家。

与出版体制改革同时，出版社开始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从1985年起，各出版社在出版局和总社领导下，相继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实行生产经营型管理体制。面对出版改革的新形势，各出版社根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专业分工，面向四化建设，积极开拓选题，全面贯彻出版方针，努力满足社会需要，同时不断摸索出版经营的客观规律，深化内部改革，在艰辛创业、努力开拓的过程中，走了一段不平坦的道路：在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一度强调了微观搞活而忽视了宏观控制；强调了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强调了图书品种和数量，而忽视了图书质量。总社党组及时觉察这一倾向，多次采取纠正措施。1985年上半年向全省出版系统提出了“提高图书质量，缩短出版周期，扩大发行成果，加强经营管理”的要求，并于1985年7月20日召开全省出版社提高图书质量专题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制止了一度在全国出现的“新武侠小说热”在福建的蔓延。1987年3月，总社对全省在编、在印书刊进行审读检查，对已出图书进行抽查，及时停印、停发了少数不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在制品，并对当年选题计划进行调整，删除了32种内容重复、质量不高的选题，增加了96种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新选题。在这基础上制定了《1987~1990年图书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福建跟全国一样，积极探索图书发行体制的改革，到1987年，初步形成了以国营书店为主体、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购销形式的新格局。

根据福建是对台、对外的窗口这一地理特点，各出版社解放思想，积极开展对台、对外的出版活动。早在1979年，省外文书店就首次引进台湾版图书10多万册。此后每年都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引进国外及港台版书刊。1985年，在福州举办了一次海外图书展，展出书刊5000多种、6万多册。与此同时，各社努力推进对外出版活动，闽版图书的出口数量和品种也逐年增加。1985年在厦门创办鹭江出版社的同时，先后成立省出版总社驻厦门办事处和海峡出版外贸公司。1985年12月参加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展出闽版图书689种，在参展的全国地方出版社中居领先地位。其中《刘海粟名画集》被评为参展的三部

最佳画册之一。1987年3月，香港出版界首次组团访问福建出版界，揭开了两地合作交流的序幕。从1983年到1988年初，福建出版界先后派出十多批30多人出访日本、英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并多次在东南亚各国举办书展书市，同时接待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文化界人士。海峡文艺出版社还与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了三届台湾文学讨论会。1989年，全省共出口图书306种，4.37万册，总码洋20.25万元。

1983年以后，随着出版体制的改革，编辑力量日益显得不足。社党组一面从大学毕业生源中物色适当人选，一面公开向社会招聘编辑人员。仅1984年就接受本科毕业生18人，并在福州地区招聘编辑人员21人。与此同时，社党组注意从编辑人员中培养选拔干部，在各级领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分社经营和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出版社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基建投资也不断增加。从1983年到1989年，总社所属新华印刷厂和彩印厂共投资1250万元，完成各项基建面积2.4万平方米；省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也投资629.7万元，完成各项基建面积2.31万平方米。如加上1985年地、县新华书店体制下放前后的基建投资，这个时期出版系统用于基建的总投资达4183.7万元，完成建筑面积13.77万平方米。与此同时，出版总社先后投资992万元，建成住宅面积1.99万平方米，基本上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

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文件，允许出版社试行社长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据此，省出版总社于1988年6月制定了福建省出版系统深化改革的方案，决定出版社实行社长负责制，各社在自愿前提下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接着，总社以总法人代表资格与省财政厅签订了为期三年的第一轮承包经营合同。随后，总社又分别与各直属单位签订了承包合同或任期目标责任协议书。在执行过程中，总社注意采取“放水养鱼”的优惠政策，防止“鞭打快牛”，调动了承包单位的积极性，促进了出版、印刷、发行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1990年全省出版系统利润达3744.7万元，比承包前1987年的1860万元，增长一倍多。出版系统的经济效益和整体实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1989年前后，福建图书出版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图书品种增长过快，出书结构不甚合理；有特色、高品位的著作比例小，整体质量不高；编辑素质不高，编校质量明显下降。针对这种情况，局党组从1990年起，把提高闽版图书整体质量作为中心任务，狠抓落实。首先从抓一批重点书入手，带动整体质量的提高。接着又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1991~1995年重点图书出版计划》。这个计划上报中央后，有22种、181册重点书选题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规划》，居全国各省市第十位。为了保证重点书选题的落实，采取了四个梯次分工负责的措施。第一梯次，各专业社按新书品种的15%为重点书，指定责任编辑；第二梯次，挑选30至40种图书为总社重点书，由局图书处抓落实；第三梯次，总社和各专业社正副社长、总编辑每年各抓一本重点书；第四梯次，出好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本书”。后三个梯次，均作为指令性任务，编辑、发排、审校、印装均采取重点保证措施，年终进行统一考核。1992年10月，局党组又进一步制定了提高图书质量的12条措施，包括强化质量意识、明确质量标准、控制新书品种、调整图书结构等，使提高图书质量的要求落到实处。

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下达后，福建积极推行“三放一联”的改革，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

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到1990年，全省多渠道发行的格局继续发展，各出版社自办发行已初具规模。全省新华书店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全省集体、个体书店（摊）已达到2125家。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闽版图书发行和农村发行严重萎缩。据统计，1990年全省县以下各种图书发行网点共计1469个，比1986年减少577个，下降28.1%。其中供销社售书点1342个，比1986年减少549个，下降29%。由于农村发行网点锐减，闽版一般图书的发行量也逐年减少。为了解决农村图书发行问题，1991年，省出版局先后组织三批人员分批赴全省4市8县20多个乡镇进行专题调查，随后召开了全省农村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并与供销合作总社一道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1991年县以下网点开始稳定，1992年有所回升。

1989年，中央扫黄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黄”斗争。当年8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南方四省“扫黄”座谈会，李瑞环同志指名批评福建石狮出现兜售黄色录像带的问题。省委、省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迅速在省、地、县三级成立“扫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省“扫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新闻出版局，局党组迅速抽调干部积极参加“扫黄”斗争，在很短时间内收到了预期效果，遏制了歪风邪气。同时，结合“扫黄打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整顿出版社和音像单位的工作，压缩报刊，对书报印刷厂和集体、个体书店进行全面整顿和重新登记。在整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出版行政管理的法规和制度，如《福建省图书报刊出版管理条例》，已经省人大通过立法。此外，在地（市）成立新闻出版办公室，作为出版行政管理机构。经过努力，在省、地、县三级组建了一支280人组成的书刊、音像制品执法检查队伍，由省政府颁发统一的执法检查证，并在省新闻出版局设审读室，负责对全省书报刊的抽查和审读。通过这些措施，福建省出版物的社会管理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律化轨道。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福建出版业在印刷技术改造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绩。福建新华印刷厂和福建彩印厂进一步加快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步伐。福建新华印刷厂积极引进电脑照排系统、彩色桌面拼版系统、电子分色机、八色轮转胶印机、对开四色胶印机、胶印书刊轮转机、平装胶订联动机、贴塑机等国内外现代先进技术设备，同时重视缩短印刷周期，提高印装质量。课本印装质量在全国印刷质量评比中一直保持全国先进水平。福建彩印厂于1989年与香港华闽（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办厂，更名为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合资后引进了日本产747型电子分色机及秋山四色胶印机各一台，投产后保持了彩印技术与质量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后来又增添了电分机高端联网系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四色胶印机和精装生产线，使企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一章 出版机构、出版者

福建出版机构从雕版印刷兴起以后，经历了从古代雕印业、近代新兴出版机构到现代出版机构的历史演进过程。福建古代刻书业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存在官刻、坊刻和家刻（亦称私刻）三大刻书系统。官刻由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出资刻印，旨在推广官定读物和儒家经籍，弘扬传统文化；坊刻由书坊经营者出资刻印，以盈利为目的；家刻由私家出资，旨在推广学术文化，宣扬乡贤事迹。书坊刻书意味着刻书业的商业化，是书籍商品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在这以前，书铺只是单纯买卖，书铺主人只是一般商人。有了刻印书坊，才开始出现经营刻书的出版商。书坊内部具备从编辑、刻印到售卖等一整套生产经营业务，各个环节都有人负责。在古代福建三个刻书系统中，刻书坊肆兴起最早，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是古代刻书业的主流。官刻机构大多委托当地书坊代印，官办作坊极少。家刻也依靠当地刻印力量。

近代新兴出版机构是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成立的，以引进西方先进的石印、铅印技术设备为标志。近代出版业带有依附性和过渡性，从依附外国教会、依附洋务机构到成立独立的新型出版机构，前后经过几十年时间。辛亥革命以后传统的雕印机构，被拥有铅印设备、从事编印发行业务的现代出版机构全面取代。

民国时期，福建出版机构以民营为主体，机构不少，但出版业发展缓慢。1929年红军入闽以后，在闽西苏区建立红色政权，创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出版机构。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抗日爱国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中共地下党和爱国民主人士在福州、厦门等地创办各种杂志社，主要是编印刊物，反映进步要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福州沦陷，永安成为全省文化中心。进步作家黎烈文在中共地下党支持下，创办改进出版社。在它带动下，民营出版社纷纷成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反共高压下，出版业又趋萎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福建出版业日趋萧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成立了福建新华书店，并着手整顿出版业。1951年成立福建人民出版社，统一经营全省的出版业务，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出版体制，保证了出版业的健康发展。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在泉州、厦门成立出版社，但存在时间很短。1958年12月，以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教育编辑室为基础，成立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归省教育厅领导。20世纪60年代初，福建人民出版社机构精简，编制紧缩。“文化大革命”初期，福建人民出版社机构实际上被撤销，代之以毛主席著作印制办公室。197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机构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出版事业蓬勃发展，出版机构增多，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复办的福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改名福建教育出版社）外，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福建美术出版社、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鹭江出版社、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和海风出版社相继成立。单一的出版体制被多元的体制所取代。

第一节 政府出版机构

一、古代（1840年以前）官刻机构、官刻主持者

福建古代官刻主要指政府机构和官学。元代以后从事刻书的书院甚多，这种书院往往拥有学田和官帑收入，属于半官办性质。

（一）官刻机构、官刻主持者

福建古代官刻始自北宋，以刻印大型图书闻名于世。南宋以后官刻已迅速扩及各州县。元代以各路儒学刻书最多，颇称繁盛。明代福建官刻主要在中后期，特别是以行政长官名义刻书之风甚盛，许多大型书籍都以官刻名义印行。明清时期，各级官府所刻的地方志的分量也很大。古代地方政府机构一般不设刻印作坊，刻印大型图书时大多是临时组织民间作坊分头刻印，一般图书往往委托书坊刻印。宋元时期建阳书坊经常承担官刻任务。以下择要予以介绍，后附名录。

1. 宋

福建路转运使司（转运使司简称转运司、漕司或漕台，掌地方财赋）：转运司经费充足，历任转运使多有刻书。知见有宋绍兴七年（1137年）刊晁补之《鸡肋集》70卷、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刊《太平圣惠方》100卷等10多种，数量居宋代福建官刻之首。

福建路提举司：知见有宋刻《诸家名方》2卷（年代未详，据《直斋书录解题》）。

福建路提刑司：知见有宋淳祐十年（1250年）提刑司史季温刊《国朝诸臣奏议》150卷、《山谷外集》17卷等多种。

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知见有宋嘉定二年（1209年）提举李大有刊李纲《梁溪集》180卷、附录6卷等。

福建漕治：知见有宋咸淳元年（1265年）刊《朱子语录别录》140卷、《龟山先生语录》4卷等。

福建官医提举司：知见有宋贞元年间（1153~1156年）刊刻《针经指南》1卷。

福唐郡庠（福唐属今福清县，郡庠即府学）：知见有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翻刻监本《汉书》100卷、《后汉书注》120卷等。

福州学宫：知见有宋开庆元年（1259年）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37卷、乙集23卷、丁集2卷等。元、明时续有刻书。

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公使库为接待来往官吏的官方机构，能以各种名义搜括钱财，经济实力雄厚）：知见有宋淳熙十年（1183年）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80卷等多种。

泉州郡庠：知见有宋乾道二年（1166年）知军州事韩仲通刊刻《孔氏六帖》30卷，淳熙九年（1182年）刊《潜虚》1卷等。

泉州州学：知见有宋淳熙七年（1180年）刊《禹贡论》2卷、后论1卷，宋淳熙八年（1181年）刊《禹贡山川地理图》2卷等。

泉州县斋：知见有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刊《资治通鉴纲目》59卷、宋淳祐二年（1242年）刊《政经》1卷等。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南安县学：知见有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刊《韩集举正》50卷、《外集归正》1卷等。

建宁府（府治在建瓯）：知见有宋嘉祐三年至四年（1058~1059年）刊《建康实录》20卷、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刊《史记》130卷、南宋间刊《太平御览》1000卷等多种。元明时续有刻书。

建宁府学（又称建安郡斋、建宁郡庠）：知见有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刊《大戴礼记》13卷等。元明时续有刻书。

建安漕司：知见有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刊《东观余论》10卷等。

兴化军：知见有宋乾道四年（1168年）兴化军教授蒋邕刊《蔡忠惠公集》36卷等多种。明代兴化府续有刻书。

漳州府署：知见有宋淳祐八年（1248年）刊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等。元明时续有刻书。

汀州军：知见有宋嘉定六年（1213年）汀州军鲍澹之刊《古算经》（今仅存《九章算经》9卷、《周髀算经》2卷等6种）等多种。元明时汀州府署续有刻书。

临汀郡斋（又称临汀郡庠）：知见有宋乾道三年（1167年）刊《嵩山集》20卷、宋乾道四年（1168年）刊《钱塘韦先生集》18卷、宋庆元三年（1197年）刊《古灵先生文集》25卷等。

南剑州（今南平市）：知见有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州学张敦颐刊《唐史论断》3卷等。

莆田郡斋：知见有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刊《复斋易说》6卷、宋淳祐九年（1249年）刊《后村居士集》50卷等。

邵武军：知见有宋乾道七年（1171年）刊《高峰集》12卷。宋嘉定六年（1213年）刊《梁溪先生文集》180卷等。

建阳县斋：知见有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23卷等。

汀州宁化县学：知见有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县学王观国刊《群经音辨》7卷等。

莆田县学：知见有宋宝庆三年（1227年）县学教官陈森刊《迂斋先生标注崇古文诀》20卷等。

永泰县学：知见有宋宝祐五年（1257年）刊《宋宰辅编年录》20卷等。

安溪县印书局：乾隆《安溪县志·古迹》载：“印书局：在县治琴堂之右。志载：（知县）陈宓刊《司马温公书仪》、《唐人诗选》；周埭刊《西山仁政类编》、《安溪县志》”等书。

这是我国较早以“印书局”命名的刻书机构。

2. 元

福建行中书省：知见有元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289~1291年）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魏天祐刊《资治通鉴》294卷等多种。

福州路儒学：知见有元至正七年（1347年）林光大刊宋陈祥道《礼书》150卷、宋陈旸《乐书》200卷、目录20卷，元至治二年（1322年）吴绎重印《通志》200卷等。

三山学宫：知见有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刊元黄缙《金华黄先生文集》43卷等。

三山郡庠：知见有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刊《通志》200卷等。

泉州郡斋：知见有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刊元汪大渊《清源续志》等。

漳州路儒学：知见有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刊宋陈淳《北溪先生大全文集》50卷、外集1卷等。

延平太守吴实斋：知见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刊元黄镇成《秋声集》10卷。

汀州路总督府：知见有元至治三年（1323年）知事黄梓刻其父黄仲元《黄四如先生文集》5卷。

建宁路：知见有元至正五年（1340年）建宁路医官陈志刊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20卷、目录1卷。

3. 明

福建布政司：知见有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福建布政司右布政使吴昂刊明湛若水《圣学格物通》100卷，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福建布政使赵维垣刊董仲舒《春秋繁露》17卷等多种。

福建右参政沈晖：知见有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刊宋杨时《龟山先生集》35卷、年谱1卷。

福建巡抚御史（别称抚台、抚院）：知见有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福建巡抚张璋刊《周礼集说》11卷。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福建巡抚金学曾刊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55卷等。

福建巡按御史：明代福建巡按御史主持刻书的先后有张世用、胡维新、李元阳、吉澄、徐鉴等人，其中刻书最多的是嘉靖年间的李元阳和吉澄。知见有李元阳刊《十三经注疏》335卷、《史记题评》130卷、《班马异同》35卷、《通典》200卷，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吉澄刊《书集传》6卷、《礼记集说》30卷，明隆庆元年（1567年）胡维新刊《文苑英华》1000卷等。

福建按察司：知见有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按察司使潘潢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100卷、续集10卷、别集11卷，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汪文盛刊《前汉书》100卷等多种。

福建宪司：知见有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福建宪司提学金事游明刊《史记集解索隐》130卷、《宋史全方续资治通鉴》36卷等。

福建参议：知见有明嘉靖八年（1529年）福建参议高贲亨刊《伊洛渊源录》14卷、《续录》6卷等。

福建侍御：知见有明嘉靖年间福建侍御曾佩刊《紫阳文公年谱》5卷等。

福州知府：知见有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福州知府胡有恒刊《史记题评》130卷等。

福宁州（治所在今霞浦县）：知见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福宁知州钟一元刊《礼记目录》30卷等。

泉州府：知见有明万历元年（1573年）泉州知府丁一中刊《温陵留墨三种》4卷，万历十一年（1583年）泉州知府贡靖国刊《贡文靖公云林诗集》10卷、附录1卷等多种。

兴化府：知见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知府蔡善继刊《蔡忠惠公集》36卷、外纪10卷等。

长乐县令：知见有明正德八年（1513年）长乐县令汪正刊《上蔡先生语录》3卷等。